

经
济
科
学
译
库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剑桥 剑桥美国 经济史 (第三卷):

20 世纪

斯坦利·L·恩格尔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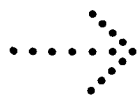
Stanley L. Engerman / 主编

罗伯特·E·高尔曼

Robert E. Gall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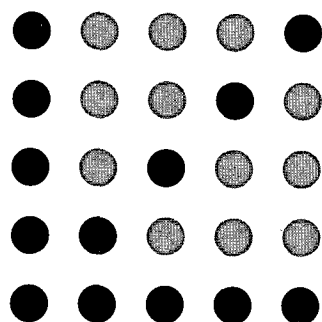
高德步 王 珏 / 总译校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 本卷主译



经济学译库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
“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



剑桥美国 经济史

20世纪

(第三卷):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斯坦利·L·恩格尔曼

Stanley L. Enge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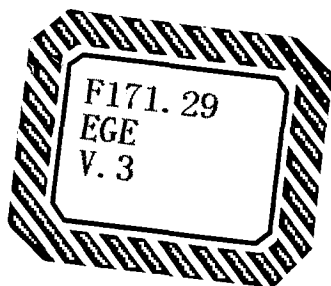
/主编

罗伯特·E·高尔曼

Robert E. Gallman

高德步 王 珏 / 总译校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 本卷主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美国经济史：20 世纪. 第三卷/恩格尔曼等著；高德步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科学译库)

ISBN 978 - 7 - 300 - 09395 - 6

I. 剑…

II. ①恩…②高…

III. 经济史—美国—20 世纪

IV. F17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0713 号

经济科学译库

剑桥美国经济史 (第三卷)：20 世纪

斯坦利·L·恩格尔曼 主编

罗伯特·E·高尔曼

总译校 高德步 王 珏

本卷主译 蔡 挺 张 林 李雅菁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59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53.75 插页 2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 210 00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卷译者名单：

蔡 挺 王晓亮 匡静诺 董筱丹
张 林 胡丽莉 周耀东 周祝平
黄 萍 李雅菁

译者序

《剑桥美国经济史》展示了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经济史研究取得的重大进展，这些进展有的得益于经济史学科本身的发展，比如研究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有的得益于社会史、劳工史和政治史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使经济史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剑桥美国经济史》汇集了对美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把握美国经济变迁，还把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经济史也包括其中。因此，它涵盖的范围比其他美国经济史著作更广。

《剑桥美国经济史》是一部论文集，但作为优秀的论文集并不是论文的简单组合，编者的工作尤其重要。《剑桥美国经济史》的两位编者恩格尔曼和高尔曼都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是新经济史学和历史计量学的先驱者和杰出代表，高尔曼曾任美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他们在新经济史学和历史计量学的重点研究领域——美国奴隶制的效率问题、美国内战的影响以及国民收入和财富等领域有重大建树，致力于用数据解读美国经济史，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并将制度因素纳入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恩格尔曼在1974年和历史计量学的重量级人物福格尔开创性地使用反事实计量法研究美国南方奴隶制问题，并且得到颠覆传统观点的结论。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将反事实计量法这种非常规，甚至逆向思维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史的研究中，为把握经济发展的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角度和层次，提高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在他们的研究中奴隶制变成一个哑变量进入计量模型，并进行相关性分析，这就将制度内生化了，完成了与新古典体系的衔接。高尔曼是早期历史计量学的杰出代表，1957年他的论文入选了美国经济史学会和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收入与财富专题研讨会的会议论文，这些会议论文被编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丛刊24卷，这是历史计量学的早期标志性成果。高尔曼一直保持旺盛的研究热情，是唯一一位先后出席三次收入与财富专题研讨会，而且论文都被收集到研究丛书中的作者，是收入与财富研究领域的常青树。1979年高尔曼对股票资本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收入与财富的研究范畴，展示了他对新课题的研究能力。

恩格尔曼和高尔曼研究方法和研究兴趣相投，编写《剑桥美国经济史》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1979年NBER举行了第三次国民收入与财富专题讨论会，会后高尔曼和恩格尔曼联合主编了美国全国经济研究丛书第51卷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恩格尔曼和高尔曼的研究成果还互为补充。高尔曼重新估算了美国19世纪的商品生产和国民收入，认为内战不是经济增长的高速时期，也不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转折点（Robert E. Gallman,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但是高尔曼没有19世纪60

年代的数据，对这10年的估算是以1960年和1970年的数据为基础的，为了弥补其不足，恩格尔曼对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战时制造业作了研究（这两个工业大州有1965年的统计数据），结果表明占全国制造业1/3强的这两个州在战时并没有显著的增长，这个结论支持了高尔曼的观点（Stanley L. Engerma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恩格尔曼和高尔曼编写的《剑桥美国经济史》目录经得起仔细推敲，既总揽全局，又重点突出，为描述美国经济发展史搭建了框架，让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论文都成为了这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Bruce C. Daniels在*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中恭喜恩格尔曼和高尔曼艺术性地完成了这个复杂的任务。Peter Fearon也祝贺编者和作者完成了如此杰出的著作。

第一卷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美国原住民、非洲人、欧洲人在美洲的早期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影响了19世纪以后美国的经济史。第二部分分析了北美北部殖民地、南部殖民地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社会经济情况。第三部分包括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重商主义政策以及宪政问题。

第二卷考察了19世纪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的经济史，描述了美国依靠丰饶的自然资源获得迅速发展，并超越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这卷包含了5个主要方面：（1）从欧洲、亚洲和非洲流入美洲的劳动力和资本；（2）向西扩张；（3）奴隶制和它的结局；（4）工业化进程；（5）经济增长的社会影响所导致的政府角色的转变。其他的专题有不平等问题、人口、劳动力、农业、企业家、交通、银行和金融、商法、国际贸易。

第三卷论述了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史，与第二卷一样由17章组成，其中有12章的研究主题相同，具体是经济增长问题、加拿大的经济史、不平等、人口、劳动力、农业（第二卷中有两章关于农业的问题，第三卷只有一章）、技术变革、商业组织、政府角色（第三卷有两章相关内容，第二卷只有一章）、银行和金融、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第三卷还分析了20世纪才明了化或者实际发生的城市化问题、大萧条问题以及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等。

《剑桥美国经济史》不仅为读者搭建了美国经济史的框架，而且收录了相关领域最优秀的论文。这些论文作者或者将鲜明的观点建立在旁征博引和翔实的史实数据上，或者对史实和数据的重视更高于观点，这种多样化的论文既有利于开启读者的视野，又激发了读者的研究兴趣，而每篇论文后的参考文献都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线索。这部书既适合一般读者，也适合专业人士。在美国和英国，很多讲授美国经济史的教师将它们选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而且Choice认为这部书“对任何学术图书馆都是有价值的”。

翻译这样一部三卷本的知名著作，我们花费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在这六年里，我们咨询过几十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跑遍了各大图书馆、浏览了无数相关网页，只求译文准确无误地反映原文。在这六年里，很多译者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动，但是他们的执著和认真终于使翻译工作顺利完成了。在这里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学亮、陈静、梁硕、周华娟等编辑，我对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深表敬佩，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这部书中文版的面世。

译者的具体分工是：高德步是本书翻译工作的组织者，也是这部译著的统稿人，王珏负责总校对和联络工作。巫云仙、王珏、蔡挺分别是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主要译者，邱竞、李淑清、李雅菁分别承担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的主要校对工作。第一卷

的译者是：巫云仙（前言、目录、索引、第1章、第2章、第3章）、龚秀敏（第4章）、韩莉（第5章）、傅巧灵（第6章）、孟秀转（第7章）、傅宏宇（第8章）、徐洁（第9章）。第二卷的译者是：王珏（前言、目录、索引）、张蔚（第1章、第9章、第16章）、李雅菁（第2章、第15章）、盛欣（第3章、第14章、第17章）、邱竞和黄锐（第4章、第5章）、毕新华（第6章）、黄瑜琴（第7章）、赵慧（第8章）、牛晓帆（第10章）、周旺和黄晶（第11章）、张培丽（第12章）、黄晓玉和张培丽（第13章）。第三卷的译者是：蔡挺（前言、目录、第5章）、王晓亮（第1章、第2章）、匡静诺（第3章）、董筱丹（第4章、第12章）、张林（第6章、第16章、第17章）、蔡挺和胡丽莉（第7章）、周耀东（第8章、第11章）、周祝平（第9章、第10章）、黄萍（第13章、第14章、第15章）、胡丽莉（索引）。邱竞、李淑清、李雅菁、顾晓波、胡安荣、王宝来通读了全书，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当我们将沉甸甸的译稿交给出版社时，我们的心也是沉甸甸的。如此一部经济史名著在我们的努力下翻译完成，但却不敢保证没有错误。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经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资助，并且是该项目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高德步

2008年3月17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3

前 言

到本卷出版的那天，整个 20 世纪将会从我们的眼前消逝，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著名时期。该卷牵涉到最近发生的事件，这个事实将意味着该卷有些时候所得到的结论，将比之前的几卷更具有尝试性。之前的两卷中，比该卷更多的历史事实已经尘埃落定，某些事件和变化的长期影响也相应清晰。大部分文章所选的截止时间是相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世纪末，有些则是选择世纪的开始。在前一卷中有两章——弗里尔（Freyer）有关商业法与菲什洛（Fishlow）有关交通的章节，也对 20 世纪做了一些讨论。

第三卷与前两卷的不同之外表现在：第三卷包括了两个关于特殊事件的章节，这在前两卷中没有先例，但是它们在 20 世纪的形成中至关重要。这些事件有着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它们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影响了整个世界。20 世纪以一次严重的、世界范围的、持续了 10 年的大萧条，以及众多国家参与的、对人类和非人类资源造成严重影响的两次世界大战为特征。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范围大大扩张了。财政和货币机构类型的扩张，对计划政策控制手段的更多运用，以及对公司和私人行为管制的加强，都是该世纪最显著的变化，它们使得 2000 年的美国经济与 1900 年有了很大的差别。由于世界范围的联系方式以及它们的变化，到 20 世纪末，有更多的资金和贸易在国与国之间流动，这也将改变世界人口流动的结构。19 世纪末，美国是资本流入的接受国，而后几乎整个 20 世纪，美国成为对世界其他地方资本输出的主要源泉。在 20 世纪早期，移民逐渐被限制和控制，但是在 20 世纪末期，与以前相比，移民的来源有了显著的变化时，它又重新达到了一个高水平。然而，在 20 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中，一个经济实体是无法完全独立的，20 世纪美国经济对他国经济依赖程度的上升是惊人的。

如同第二卷那样，我们撰文描述经济变化的速度和形式、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我们通过比较来讨论 20 世纪美国经济的增长，既与美国自身之前几个世纪经济的发展进行比较，也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关于 20 世纪加拿大经济增长这一章，继续了之前第二卷对 19 世纪加拿大经济增长情况的探讨，并且和前面一样，也进行了与美国经历的比较。例如，这两个国家的增长，都是在没有开放西方边界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这就对经济变化的本质特征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卷与前两卷相比，在生产要素的讨论方面，有着一些差异。在第二卷中，资本和土地在各自的章节中都有说明，它们都没有区别待遇。不管怎样，这些观点在第三卷的各



个章节都有讨论。本卷有一些是直接针对关于 19 世纪模式的章节的继续讨论，诸如关于人口和劳动的章节。这些变量被视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变化结果的影响因素。还有一章是关于北方的农业部门的；南方的农业部门，已经分散在各个章节中讨论了。然而，我们并没有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制造业部门，这方面的信息已经在其他各章阐述了，如结构变化一章。

这里有两篇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章。“公司经济”的发展，公司规模扩大，将导致促进增长的组织革新，这是 20 世纪变化中的一个核心方面。同样，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对科学原理的应用上，这就意味着众多经济部门的发明、革新、传播和发展的速度将会加快。

和以前一样，我们挑选了一些我们相信最有能力承担这些课题的作者，并且我们没有尝试就某些解释让这些作者的意见和编者或其他各章的作者的意见达成一致。不同的解释大致反映了学术现状和当前分析和实证的争论。这几卷都是对目前学术现状的一个指南，而不是针对某个专门问题的答案。

第三卷和所有的剑桥史一样，包括了意欲综合当前的知识、分析和争论的一些文章。但是实际上它们又无法无所不包。它们的目的就是引导读者熟悉相关课题，并且给读者提供参考文章，从而为读者的进一步研究辨清方向。我们所寻求的读者不是那些有很深造诣的专家，而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和那些对于文章的某个课题比较感兴趣，想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一般读者。

当彼得·马赛厄斯（Peter Mathias）在牛津大学主持经济史会议时，他的就职演说（1970 年 11 月 24 日）的题目是“与邻居共存”（Living with the Neighbors），这里的邻居暗指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美国，经济史并不像英国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经济史学家不是在经济系就是在历史系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如今大部分都是在经济系。然而，不管经济史学家的学术从属关系是什么，他们都必须过共同的学术生活，而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因此，与邻居共存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另一种对待问题的角度是，把与邻居共存看做是一个赐予的机会，而不是问题，因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然而，在经济和历史领域，仍然存在着学术压力。这几卷中文章的作者都体验到这种压力，并将它们纳入考虑。编辑们在挑选作者时，也为这两个学科都留了空间。

第一卷按照日程如期出版了。不幸的是第三卷则没有做到这点。尽管编辑下决心在我们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我们仍然不得不延期来保证本卷内容的完整性。一些人的拖拉行为延缓了本卷的出版，我们代表他们向尽职尽责的人们以及对该版本迟迟问世做出贡献的人们道歉。动作慢的水手们应该为航行的减慢而向动作快的水手们道歉。

在本卷的准备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经济系、罗彻斯特大学的经济系、剑桥大学的经济系和政治系的帮助。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益于这些帮助、指导以及我们的编辑弗兰克·史密斯（Frank Smith）先生的专长。在最后阶段，我们获得了卡米拉·纳普（Camilla Knapp）的专业管理。约翰·凯恩（John Kane）完成编辑，格洛里厄·多尔蒂（Glorieux Dougherty）制作了索引。

第 14 章的扩展版本是由戴维·C·莫厄里（David C. Mowery）和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撰写的，它将会以“创新之路：美国 20 世纪的技术变迁”（英国，剑桥，1998）

为题出版。

罗伯特·E·高尔曼和我合作编著三卷本《剑桥美国经济史》。在1998年11月他逝世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这三卷的构思到第一卷的出版，以及第二卷和第三卷各章最终版本的提交。所有为本书做出贡献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准备这几卷的过程中，都从他的知识、见识和良好品质中受益匪浅。

斯坦利·L·恩格尔曼



目 录

第1章	在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的时代中美国宏观经济的增长：长期考察	1
第2章	结构变化：地区和城镇的变化	58
第3章	20世纪加拿大经济史	141
第4章	20世纪美国的贫困与不平等状况	177
第5章	大萧条	218
第6章	20世纪的战争和美国经济	239
第7章	20世纪美国的对外贸易和贸易政策	300
第8章	20世纪美国的对外金融关系	342
第9章	20世纪美国的人口增长	371
第10章	20世纪的劳动力市场	401
第11章	劳工法	455
第12章	北部农业的变迁：1910—1990年	499
第13章	20世纪的银行业和金融	535
第14章	20世纪的技术变迁	582
第15章	20世纪美国的企业经济	674
第16章	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702
第17章	公共部门	735
文献评述	768
索引	800



第 1 章

在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的时代中美国宏观经济增长：长期考察

摩西·阿布拉莫维茨 (MOSES ABRAMOVITZ)

保罗·A·戴维 (PAUL A. DAVID)

本章概述与结构

在过去的 200 年中，美国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起伏波动，导致人均实际产出增长的源泉也不断变换，本章论述的重点正是这种宏观经济增长过程的性质。的确，我们的兴趣主要放在 20 世纪，但是我们相信，要想尽可能明白地弄清它的重要特征以及那些真正发挥作用的根本因素，则需要把刚过去的 20 世纪与它前面的那一个世纪进行比较才行。

对长期经济数据记录进行观测得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从 1889 年到 1989 年的这 100 年和在美国建国后的第一个 100 年当中，导致人均实际 GDP 增长的源泉迥然不同。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高度集约型增长模式，而且它的集约程度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与组织知识的获得与开发。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对美国宏观经济记录的各个部分在数量上进行详细的整理与描述，以体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差异的本质与维度。我们是在“增长核算法”较为完善的框架内完成这项任务的。作为资本和劳动生产力的加权平均的综合要素生产力，它的增长率中有一个长期加速度；作为劳动要素生产力和人均产出增长的源泉，综合要素生产力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使用“增长核算法”能够把这些全都表现出来。若进一步考虑到生产投入在质量上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做到对综合要素生产力增长的“精确”计量，它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与 1879—1909 年这个过渡时期前后相邻的两个时代之间的对比。

首先，我们无法用可计量的要素投入来解释劳动生产力长期增长率中的作用因素，它是与技术知识进步——虽然也并非完全契合——联系在一起，其

中包括实现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所需的知识。19世纪与20世纪的第二大差异是20世纪中传统的有形资本积累的相对重要性大大降低了，无形资本的地位日益提高。无形资本的形成一方面通过对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有组织的对研究与开发（R&D）进行的投资。

进入20世纪以后，固定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过程中充满了对立的因素。在接连几十年中，劳动供给增长减速，与此同时工资水平却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大幅度提高的趋势，这使得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状况部分起因于人口变动，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移民输入限制，还有一部分起因于工作时间的缩短和教育年限的延长。同时，通过提高对固定设备使用的集约化程度，人们也有机会降低成本。

这种固定设备的使用策略首先应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铁路联合中使用了它，在为提高火车车速和功率使用效率的技术改革中使用了它，在一系列加工业特别是石油开采、交通运输、炼油直至石油化工行业中也用到了它。正如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Jr.）指出的那样，1870年以后厂商的生产和直接销售活动扩展到日益广泛的市场，此时出现了大批量生产的制造业，它们正是这种策略的出处所在。

2 经营面临的挑战使技术和商业制度在整个大陆得到了极大的扩展，除此之外，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受过更正规的教育的未来管理人才，以及具备更高文字与数学素质的工人。得益于19世纪中期电报系统与铁路运营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在通讯与信息技术领域一直遥遥领先，对这种领先优势起重要作用的控制技术此时也亟待推陈出新，其结果是在20世纪里带动电话系统与计算机系统的发展。

这样一来，不管20世纪新技术思想有多么独特和不同，我们也能看出，20世纪中一连串多用途技术在美国的改进和应用——电力、电信、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以及最近的数字计算机——反映出来的是全球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最先在美国表现出来，并且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充分，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这些发展仍是以19世纪的特定成果为基础的。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导致美国经济在20世纪中登上全球统治地位的因素，同时说明促使美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潜在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转变的。在我们的解释中最重要的因素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因素是那些可被认为是普遍的、全球性的趋势，它们与国际广泛共享的科技成果相联系。20世纪出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强大新生潜力，若在美国背景下分析生产方式和生产性资源内生增长的意义，就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单独的、一国的现象。更准确的想法是，它们是更为广泛的全球趋势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是在美国背景下以一种特别的形式较早地出现而已。

我们对可获得的文献的研究表明，19世纪革新的整个重心集中在节约劳动这个方向上，与自然资源节约的趋势相比，相对来说它不仅更加明显，而且它比可再生的有形资本投入的应用具有更强大的效果。我们确实认为，19世纪的技术进步是以偏重资本使用为特征的。^[1]相对而言，从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20世纪出现的特点是重心偏向于无形资本使用的革新。在节约劳动革新

的同时推出了节约有形资本的技术，但重心还是偏向于后者，这是19世纪历史的沿袭。

在第二大类因素中，有些是带有比较美国化的特色的，这种美国化的状态在19世纪开端之时就已经被世人们充分地感觉到了，它被当代的人们引用来解释美国与“旧世界”之间的差异，即在组织与安排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其中有些因素来源于先前资源开发与技术改革的大潮中，在上一个时代的飞速发展时期中就已经存在了。另外一些因素当然就是反映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精神特点的那类了，它们要么只特定地属于后期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年轻社会，要么在这些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技术对要素市场上需求方力量的驱动引发了供给方的反应，促进了新的超越传统的无形资本的形成，特定的人口和制度的发展也帮助改变了要素供给状态，这些都使得20世纪美国的增长路径具有不同于先前时期宏观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然而，在资本持续积累以超过产出增长速度进行时，当代经济在长期动态发展中就呈现出与过去历史保持连续性的重要特点。

第三，让我们把视角从美国20世纪的发展图景转向前一世纪，再联系其他工业国家的同时代历史来考察美国的增长路径。就其居民所享有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而言，在20世纪的前半段美国就已经登上了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此种状态的基础是该国相对于其他已经工业化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所具备的生产力优势得到早期确立和进一步的扩展。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年代中，美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富裕的顶尖统治位置，但其地位很快受到其他饱受战争摧残而后经济复苏的国家的削弱，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仅出现了逼近和赶上美国的强大趋势，在某些领域还大有领先于美国的劲头。对这一时期美国增长历史的国际性探讨在本书的稍后部分展开更加充分的探讨，我们对导致全球舞台上各个经济相对地位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广泛的分析。许多在树立美国的物质和技术优势地位、创造“美国例外论”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随后丧失了它们先前的意义——因为在20世纪里，它们要么在本国发生了转变，要么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各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这些发展，特别是那些作为战后时代成果发生的变化，会有助于解释美国的工业化地位所发生的改变。

1800年以来美国增长的统计数据

衡量的问题

A. C. 庇古 (A. C. Pigou)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居民的人均产出“相当于该国可计量的客观的经济福利”。人均产出只是经济福利内容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在这里把人均产出增长作为本章的关注点。我们的目标具有

两重性：首先，要为美国的增长及增长所依据的那些潜在因素和源泉画出统计图表；其次，我们要找出有哪些条件或力量在控制着上述因素并使其发生变化。我们以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描述鉴定增长的潜在源泉：

从而我们就可以说……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因而，生产的增加就依赖于这些要素的状况，它要么是要素本身增加的结果，要么是它们的生产力增加的结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shley Edition, 156）

- 5 最终我们必须寻找出“要素”及其“生产力”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但我们的研究是有限的，它被局限在我们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本章篇幅所允许的范围内。所以我们早早地就把注意力投向最深层原因，这些原因造就了美国式的态度与热情，产生了管理美国经济体系运行的制度，并为劳动、资本积累、企业和实用知识的进步提供激励；但是我们无法对这些基本条件进行系统的探索分析。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只是进行描述。^[2]

我们能以相当的确定性进行研讨的是那种以可见数据的形式出现的增长。以数据形式出现的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率是可以计量的，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即产出漏出商品市场的情况。这样的计量既不是全面的，也并非是没有偏差的。如果可能的话，必须把在家庭或农场中生产的但未进入市场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包括进来，要么依据粗略的估算，要么完全忽略掉。总产出中具有相当意义的部分——土地开垦与灌溉、木材砍伐与加工、谷物种植、食品的贮藏和罐装、儿童、病人与老人的护理、设备与家具的维修、知识与娱乐的提供——已经从内部家务转入了市场，可是有时又退回到家庭中，这就使得对增长的计量发生正负偏差。在对产出增长源泉的计量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麻烦问题，特别是各种不同源泉的贡献，表格中它们似乎是在相互独立地对增长发挥作用，可事实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作用推动了增长。可能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对产出的计量中，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与种类的巨大进步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只要在衡量 GDP 指标的基期年份中单位成本相同，用药糊和盘尼西林治疗细菌性肺炎对于我们的计量是没有区别的。同理，使用驿马、电报、电话还是 E-mail 进行通讯也是一样的。考虑到这一点，经过质量调整的产出计量数字就比现有计量结果增长得快。可是现有计量方法也忽视了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成本，例如拥挤、污染、噪音和城市犯罪——当然这是作为对他们的文化财富、智慧活力和激励的报应。没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个对增长的真实全面的计量是什么样子，也不存在进行这种计量的完全客观的方法。这些困难必须暂时放在一边，但是不能置之不理，我们稍后再讨论它们。同时我们对人均产出进行研究，因为它是长期中人们衡量产品与服务总量的唯一可行方法。

6 在本章中我们研究的增长指的是国民产出的长期持续增加，虽然商业活动既有在相邻年份之间的涨涨落落，也有历经多年的大范围的波动，但增长的趋势是持续的。在 19 世纪与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经济中，这种波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所熟悉的“商业周期”，一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它在美国保持的周期

长度都为5年。但是利用连续周期中平均水平或高峰年份的数据计算增长率，当上述商业周期效应被这种计算方法所抵消时，周期更长的新一轮波动又开始了。据美国的经验，这种“长波”从19世纪早期到1930年左右以15年至25年的间隔连续出现，从那以后又以变化过的机制出现。那么，为了恰当地计量这种持续增长的趋势，我们必须计算长波中相似相位之间的增长率，并挑选出一些年份，使它们能够在商业周期的位置中代表这些可比较相位。

7 其中有不规则的因素，尤其在1855年至1871年和1929年至1948年的长波周期中显得特别突出。前者是美国内战及战后的混乱时期，后者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第二次大战中战争导向的剧烈波动时期，它们都以产出增长失常的急剧减缓为特点。30年代的大萧条抑制了投资，战争给民间投资带来了限制，致使私人资本积累严重减少，阻碍了正常的生产力增长，而美国内战的影响则更加显著。在这些战争随后的时期中，产出、资本积累和生产力增长的高涨一部分是对先前投资和技术革新受到阻滞的反弹。

对于内战后的美国而言，则是重建战时及战后遭受严重破坏的南方经济。把被打断时期和其后反弹时期的记录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观察经济进步所隐含的长期趋势，表1.1以及文中类似的表格就是为此绘制的。

最后要说的是，通篇的数字都受到估算误差的干扰，但是我们判断内战之前的数字误差比战后的更严重。为了对长期增长进行更精确的描绘，把内战前的历史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似乎更合适，于是在表1.1以及后面的表格中1800—1855年便以一段长时期形式出现。我们把表1.1和后面类似表格中的数字称为“跨越长期的计量”。

表 1.1 国民经济与美国国内私人经济产出的增长率，1800—1989年
（“长期”中的平均复合比率，以年百分比为单位）

时期	人均比率			集约增长比率 (%)			
	GNP	GPDP	人口	(GNP/P)	(GPDP/P)	GNP	GPDP
I. 19世纪							
1800—1855	3.99	3.93	3.03	0.93	0.87	23	22
1855—1890	4.00	3.92	2.41	1.55	1.47	39	38
1890—1927	3.56	3.50	1.73	1.80	1.74	51	50
II. 20世纪							
1890—1927	3.76	3.70	1.73	2.00	1.94	53	52
1929—1966	3.18	3.05	1.30	1.86	1.73	58	57
1966—1989	2.69	2.86	1.00	1.67	1.84	62	64

注：在此表及表1.2~表1.4中，1855年、1890年和1927年的数据是以高峰年份为“长波”尾声的五年的平均数的中点，所以1855—1890年更确切地说应该是1853—1857年至1888—1892年。其他终点年份是被选出来代表长波高峰的单独年份。

资料来源：见统计附录。

8

本章所关注的产出范畴是“国内私人经济”，这比总体的国民产出要小一些，因为后者还包括“政府产出”，即由政府直接向生产要素进行的支付。这实质上是给政府雇员的报酬，因为国民账户把政府利息支付当做转移支付而非要素报酬对待。要得到美国境内要素所生产的总产出，国内私人经济必须把从国外得到的要素净收入也排除在外，就是被外国雇佣的美国公民的资本与劳动收入超过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与资本收入的部分。在19世纪这两部分的规模都不大，当政府产出在后来日益重要的时候，国民总产出和国内私人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也是非常接近的。

与国民总产出相比，国内私人产出更适宜于衡量生产状况。那是因为实际政府产出经过了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的调整，它是通过一个人均名义工资指数对当前工资水平折算得到的。所以实际政府产出实质上是对政府雇佣规模增长的计量。先前认为的政府工作人员生产力的增长就此消失了，这意味着国民范围内而不是私人范围内生产力计量出现下降的偏移。

每个表格中的第一部分是19世纪的情况，第二部分对应的是20世纪。这两部分对产出数字进行估算的方法和依据资料有所不同，由此它们在各自的基础上都对世纪之交年代给出了不同的数字。上半部分中世纪之交时期的数字适于和更早些年代进行比较，而下半部分中同期的数字更适于和晚些年代进行比较。

表1.1以及往后绝大部分表格中的产出数字表示的是折算前的总产出，折算后的净产出才是对与经济福利相关的产出的更好的计量指标。然而，净产出与总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对生产力的衡量来说总产出要更好一些。

产出、人口和人均产出

9

表1.1和随后的表1.2至表1.4计量了美国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产出增长的步伐，囊括了美国发展及其潜在源泉的主要特征。这些数字只是寻找支配增长的因素研究的开端，但却是个很有用的开端，它提供了对美国历史数量描绘的框架。

我们来看表1.1中各个长时期的记录，会发现19世纪拥有4%的总产出增长率，不管是对国民经济（GNP）还是对国内私人经济（GDP）的考察都是如此。可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这个速度开始下降，从前一个世纪的4%慢慢下降到最近这25年中的每年低于3%。19世纪的4%及其在20世纪里的逐渐下降都是由总产出增长中各种组成因素的发散变化趋势造成的，也就是人口增长和人均产出增长的结果。

19世纪前半期的人口增长是非常迅速的，但自那以后没经历多少逆转它就减缓下来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短暂的婴儿激增时期是个独特的例外，但人均产出增加是迅速的。它经过了两个阶段，在19世纪上下半个世纪之交时有一大步，在19世纪后半期与20世纪前1/4时期之交有一小步，但后者